

中国对 RCEP 成员国出口贸易潜力 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扩展贸易引力模型

李春梅，罗昊天

(兰州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甘肃 兰州 730050)

[摘 要]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更是中国在国际贸易领域继加入 WTO 以来的第二大事件。RCEP 的成立有利于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框架中“国际”一环的发展，同时也在提高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水平、打击贸易保护主义及逆全球化势力等问题上产生巨大影响。基于扩展贸易引力模型的视角，依托中国与 RCEP 成员国现有的商贸基础，研究中国对 RCEP 成员国的出口贸易潜力，分析影响出口的有关因素，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性建议。

[关键词] RCEP; 出口贸易潜力; 影响因素; 贸易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 F75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6043(2021)09-0001-04

DOI:10.19905/j.cnki.syj1982.2021.09.001

Abstract: The signing of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RCEP) is a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It is also the second major event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 field after its accession to WTO. The establishment of RCEP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part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ual cycle" framework. Meanwhile, it will have a huge impact on improving the level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combat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anti-globalization forc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xpanded trade gravity model and the trade basis among China and RCEP member states, the study researches the export trade potential of China to RCEP member states,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export, and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accordingly.

Key words: RCEP, export trade potential, influencing factors, trade gravity model

一、引言

2020 年 11 月 15 日，第四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领导人会议促成了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共十五个亚太地区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以下简称“《协定》”)，这标志着长达 8 年的“马拉松式”谈判就此结束。据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显示，RCEP 覆盖人口达全球总人口的 29.5%，GDP 达全球总值的 29.4%，出口贸易总额达全球总额的 26%，已成为当下覆盖人口最多，经济贸易往来规模最大，同时也最具发展潜力与前景的自贸协定。

从中国经济发展视角出发，RCEP 是打开“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环，更是贯彻落实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理念的伟大实践。同时，RCEP 也为我国“十四五”规划实现了“开门红”，将更有力地推动我国

在新发展阶段拓宽国际合作领域。

从亚太区域经济发展视角出发，由于受到现有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加之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逆全球化等势力的干扰，亚太区域经济发展不容乐观。通过 RCEP 与“一带一路”战略的结合，将有力提振区域内各国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同时，也将显著提升亚太区域的经济一体化水平。《协定》中有关贸易便利化、数字化的政策将显著优化区域内部整体营商环境，进一步扩大自贸协定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此外，《协定》中有关市场准入、原产地、海关程序等规则的制定，将有效促进区域内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对拉动区域内市场的扩容升级将产生巨大作用。

二、实证分析

(一) 变量设定与数据选取

1. 变量设定

[作者简介] 李春梅(1973-)，女，甘肃武威人，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区域经济与产业发展。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产业关联溢出效应的中国区际产业转移绩效比较研究(15XJL008)；兰州理工大学红柳扶持学科项目(201801)。

贸易引力模型来源于牛顿的万有引力定理,即世界上一切物体间的引力作用关系,与物体自身的质量成正比,而与物体间的距离成反比例。Tinbergen 与 Poyhonen 最早提出贸易引力模型,以上两位学者通过对双边贸易流量进行测定,得出两个国家间的贸易量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而与国家间的地理距离成反比例的结论。基本公式(1)为:

$$EX_{abi} = \frac{A \times GDP_{ai} \times GDP_{bi}}{DIS_{ab}} \quad (1)$$

其中, EX_{abi} 表示 i 年 a 国对 b 国的贸易总量, A 为常数项, GDP_{ai} 与 GDP_{bi} 分别表示 i 年 a 国和 b 国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常以国内生产总值 GDP 表示, DIS_{ab} 是 a 国与 b 国间的地理距离。

对基本公式两边同时进行对数处理,可以在不改变数据性质及相互关系的前提下,缩小数据的绝对数值,便于计算,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异方差对模型的影响,可得如下线性公式:

$$\ln EX_{abi} = \alpha_1 + \beta_1 \ln GDP_{ai} + \beta_2 \ln GDP_{bi} + \beta_3 \ln DIS_{ab} + \varepsilon_1 \quad (2)$$

其中, α_1 为常数项,即截距; $\beta_1, \beta_2, \beta_3$ 为回归系数,表示相应解释变量的弹性,即当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时,该变量变动 1% 时,对被解释变量 $\ln EX_{abi}$ 的影响程度; ε_1 表示随机误差项,即模型未能考虑到但真实存在的误差。

考虑到影响双边贸易流量因素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研究学者逐步将其他解释变量引入原有贸易引力模型方程(2)内,构建出扩展引力模型。周曙东和郑建(2018)^[1]将人口变量等纳入考虑范围,周念利(2010)^[2]引入“是否存在共同语言”等虚拟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以上变量与双边贸易发展确实存在一定的显著关系。

综上所述,本文选取以下七个变量在 2010–2018 年的数据来构建扩展贸易引力模型并测算中国与 RCEP 成员国间的出口贸易潜力^[3]:

(1)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 (GDP_{ai}), 以 i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进行表示。中国的 GDP 水平意味着中国能够产生的对外出口商品的总量,作为扩展引力模型的基础变量,对模型产生巨大影响。

(2) RCEP 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 (GDP_{bi}), 以 i 年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进行表示。各国 GDP 水平意味着能够从中国购买进口商品的能力,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消费需求,是模型无法忽视的解释变量之一。

(3) RCEP 成员国人口总量 (POP_{bi}), i 年各成员国内部的人口总量预示着该国此时的消费能力。显然,仅考虑进口国的 GDP 水平是较为片面的,通过加入人口变量,可提高模型的准确性。

(4) 中国与 RCEP 成员国间距离 (DIS_{cr}), 以各自首都间的直线距离进行测定。根据原始贸易引力模型,两个贸易国间距离的大小,对国与国间的运输方式与运输费用等会产生巨大影响,进而反作用于双边贸易的开展。

(5)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RATE_{usi}$), 以 i 年汇率的直接标价法测算。汇率对国际贸易的开展至关重要,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降,意味着人民币贬值,有利于中国商品的

出口;反之,则不利于出口贸易的开展。

(6) 中国与 RCEP 成员国间是否存在共同边界 ($BORDER$), 该变量为虚拟变量。共同边界的存在有利于进出口贸易的开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节省相关出口成本。由于地理区位在较长时间内不会发生变动,因此本文将存在共同边界设为 1,将不存在共同边界设为 0。

(7) 中国与 RCEP 成员国间是否存在共同语言 ($LANG$), 该变量为虚拟变量。地理区位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语言,然而语言沟通的顺畅程度将对贸易产生较大影响。一般说来,具有相似语言背景的人群可以较轻松地产生贸易关系。因此,本文将存在共同语言设置为 1,不存在共同语言设置为 0。

2. 数据选取

考虑到数据的连贯性与可获取性,本文选取中国出口 RCEP 成员国 2010–2018 年的数据构成样本集合。被解释变量中国出口 RCEP 各成员国贸易量 EX_{cr} 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数据库,经笔者整合得到出口贸易总量。中国与各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 GDP_{ai}, GDP_{bi} 和 RCEP 成员国人口 POP_{bi} 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 (WDI) 数据库,中国与各成员国间的地理距离 DIS_{cr} 、共同边界 $BORDER$ 和共同语言 $LANG$ 来自法国 CEPII 数据库,人民币兑美元汇率 $RATE_{usi}$ 来自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如表 1 所示。表 2 是对各变量数据取对数后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变量数据选取与说明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	变量说明	数据来源
$\ln GDP_{ai}$	中国历年 GDP 总量	中国 GDP 越高,表明国内生产能力越强,越能支持对 RCEP 成员国的出口	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ln GDP_{bi}$	RCEP 成员国历年各国 GDP 总量	RCEP 各国 GDP 越高,表明国内市场消费能力越大,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潜力也就越高	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ln POP_{bi}$	RCEP 成员国历年各国人口总量	RCEP 各国国内人口数量越多,说明本国劳动力资源充足,可自动实现国内需求的满足	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ln DIS_{cr}$	中国与 RCEP 成员国首都间距离	中国与贸易国间地理距离越近,贸易成本越低;反之,则越高	CEPII
$\ln RATE_{usi}$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直接标价法)	汇率下降,人民币相对美元贬值,有利于出口;反之,将会抑制商品出口的发生	世界银行 WDI 数据库
$BORDER$	是否存在共同边界	贸易国间存在共同边界,便于开展贸易	CEPII
$LANG$	是否存在共同语言	贸易国间存在共同语言,便于开展贸易	CEPII

表 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	观测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 EX_{cr}$	126	14.307	1.569	10.512	16.534
$\ln GDP_{ai}$	9	29.914	0.243	29.437	30.263
$\ln GDP_{bi}$	126	26.121	1.774	22.687	29.456
$\ln POP_{bi}$	126	17.037	1.652	12.87	19.405
$\ln DIS_{cr}$	14	8.177	0.582	6.862	9.309
$\ln RATE_{usi}$	9	1.864	0.036	1.815	1.913
$BORDER$	14	0.214	0.412	0	1
$LANG$	14	0.143	0.351	0	1

(二) 模型构建与结果分析

1. 模型构建

基于前文的理论研究基础,将 RCEP 成员国人口总量、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否存在共同边界及共同语言引入基础的贸易引力模型,形成本文研究的扩展引力模型,如式(3)所示。

$$\ln EX_{cr} = \alpha_1 + \beta_1 \ln GDP_{ai} + \beta_2 \ln GDP_{bi} + \beta_3 \ln DIS_{cr} + \beta_4 \ln POP_{bi} + \beta_5 \ln RATE_{usi} + \beta_6 BORDER + \beta_7 LANG$$

$$+\beta_3 \ln RATE_{it} + \beta_4 BORDER + \beta_5 LANG + \varepsilon_1 \quad (3)$$

本文采用 Stata15.1 对上述变量 2010–2018 年的数值构建面板数据,进而依次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异方差检验、自相关检验、F 检验及 Hausman 检验展开分析。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但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且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 OLS 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共线性检验、异方差检验、自相关检验及模型甄别结果

检验内容	检验方法	检验结果
共线性检验	VIF 检验	VIF<10,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异方差检验	White 检验	Prob>chi2=0.0000,存在异方差
	BP 检验	Prob>chi2=0.0000,存在异方差
自相关检验	Wooldridge 检验	Prob>chi2=0.0000,存在自相关
模型甄别	F 检验	Prob>F=0.0000,固定效应模型优于混合 OLS 模型
	Hausman 检验	Prob>chi2=0.3867,随机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

2. 结果分析

通过以上检验,发现面板数据中存在异方差与自相关的问题,且随机效应模型优于混合 OLS 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基于此,本文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GLS) 模型估计回归系数^[4]。表 4 列出了混合 OLS 模型 (1)、固定效应模型 (2)、随机效应模型 (3) 及 GLS 模型 (4) 的回归结果。

表 4 不同模型下的回归结果^①

	OLS (1)	FE (2)	RE (3)	GLS (4)
$\ln GDP_{it}$	0.659*** (-0.147)	0.419** (-0.137)	0.615*** (-0.0896)	0.657*** (-0.0189)
$\ln GDP_{it}$	0.656*** (-0.0328)	0.882*** (-0.123)	0.778*** (-0.0617)	0.655*** (-0.0083)
$\ln DIS_{it}$	-0.455*** (-0.0659)	0 (.)	-0.452*** (-0.116)	-0.454*** (-0.0133)
$\ln RATE_{it}$	-2.061* (-0.987)	-2.213*** (-0.445)	-2.020** (-0.732)	-1.991*** (-0.121)
$\ln POP_{it}$	0.212*** (-0.033)	1.431 (-1.084)	0.132* (-0.0621)	0.211*** (-0.0044)
$BORDER$	0.16 (-0.111)	0 (.)	0.401 (-0.452)	0.175*** (-0.0496)
$LANG$	1.126*** (-0.106)	0 (.)	1.074*** (-0.178)	1.130*** (-0.0386)
$CONS$	-18.76*** (-4.887)	-41.53** (-14.12)	-19.45*** (-2.716)	-18.83*** (-0.601)
N	126	126	126	126
R^2	0.940	0.772	0.766	

经过 Stata15.1 的回归处理,各解释变量在扩展贸易引力模型的 GLS 回归结果中均通过了 1% 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通过比较发现,GLS 模型回归的结果与混合 OLS 回归的结果较为接近,且四种回归模型的系数符号均一致,拟合优度在 0.766 至 0.940 之间,综上所述,回归模型的稳健性较好且回归结果合理。其中,由于运用 GLS 模型进行回归时, R^2 无法将模型总体平方和细分为回归平方和与残差平方和,因此 R^2 不能用作 GLS 回归的诊断工具。本文以模型 (4) 回归结果为基准,最终确定的扩展贸易引力模型公式为:

$$\begin{aligned} \ln EX_{it} = & -18.83 + 0.657 \ln GDP_{it} + 0.655 \ln GDP_{it} \\ & -0.454 \ln DIS_{it} + 0.211 \ln POP_{it} - 1.99 \ln RATE_{it} \\ & + 0.175 BORDER + 1.130 LANG \end{aligned} \quad (4)$$

具体到每个变量,由式 (4) 可知,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当中国 GDP 上升 1% 时,将引起出口至 RCEP 成员

国的贸易量提高 0.657%,同理,当 RCEP 成员国 GDP 上升 1% 时,将引起从中国进口商品贸易量增加 0.655%,而当贸易双方地理距离扩大 1% 时,双边贸易量的发生额就会降低 0.454%,这与基本的贸易引力模型的系数假定是相吻合的。

对于 RCEP 成员国人口数量来说,当人口数量增加 1% 时,将引起贸易量增加 0.211%,随着人口数量的激增,当前国内生产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国内需求时,会扩大从外国的进口 (此处指从中国的进口),进而带动双方贸易量的增加;就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而言,汇率每上升 1%,将会导致贸易国间的贸易量下降 1.991%,这与理论知识产生偏差,可能是由于 RCEP 成员国内部发展中国家占据大多数席位,在抵御经济变动带来的影响时没有发达经济体那样稳健,受汇率变化影响较不稳定;共同边界与共同语言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双边贸易的开展,由回归结果可知,以上两个因素将分别带动贸易量增长 0.175% 和 1.130%,这与生活实际较为贴近;中国与越南、老挝、缅甸等国毗邻,与新加坡等国有共同或相似的语言,这使得中国与这部分国家容易发生贸易关系,且更容易推动贸易活动的开展。

(三) 出口贸易潜力测定

出口贸易潜力的测定是采用实际发生的出口贸易额与模型测算出的模拟出口贸易额进行对比,并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为不同的贸易潜力等级^[5]。基本公式为:

$$EXP_{it} = \frac{EX_{it}}{EX_{it}^*}$$

其中, EXP_{it} 表示 i 年中国与 RCEP 各成员国间的出口贸易潜力指数, EX_{it} 表示 i 年中国与 RCEP 各成员国间的实际出口贸易额, EX_{it}^* 则为引力模型测算出的出口贸易模拟值。

本文选取刘青峰和姜书竹 (2002)^[6] 提出的贸易潜力划分标准作为分割依据,即出口贸易潜力指数小于 0.8,为潜力巨大型,意味着国与国之间尚有很大的贸易空间存在,需要积极落实贸易推进政策,通过改变某一要素便可有效提高双方的贸易流量;若出口贸易潜力指数介于 0.8–1.2 间,则为潜力开拓型,意味着国与国间的贸易开展较为顺利,部分贸易领域开发比较完全,现有部分领域已探索完毕,此时,国家间应主动捕获更多的贸易机会,创新现有的贸易方式与路径,为双边贸易打开一扇新的大门;若指数大于 1.2,则为潜力再造型,在这个阶段,国与国间的贸易相对而言已比较完善,大部分贸易领域已开发透彻,需要各国通力合作,开创一条合作共赢的双边贸易新道路,以解决现阶段贸易流量低速增长的问题。具体测定结果如表 5 所示。

由表 5 可知,经出口贸易潜力指数的划分,产生了 4 个潜力巨大型国家 (老挝、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5 个潜力开拓型国家 (缅甸、新西兰、菲律宾、韩国、文莱) 和 5 个潜力再造型国家 (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柬埔寨、越南),这显示出我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科学性:在与部

表 5 中国与 RCEP 成员国出口贸易潜力

	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	新西兰	文莱	柬埔寨	印尼	老挝	马来西亚	缅甸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2010 年	1.62	0.90	1.27	0.99	0.64	1.17	0.82	0.52	0.85	0.72	0.96	1.72	1.33	2.11
2011 年	1.41	0.85	1.13	0.96	0.84	1.46	0.76	0.35	0.71	0.70	0.82	1.38	1.30	1.89
2012 年	1.30	0.74	1.04	0.85	1.22	1.41	0.77	0.55	0.79	0.72	0.81	1.33	1.30	1.78
2013 年	1.14	0.75	0.92	0.77	1.54	1.50	0.75	0.82	0.86	0.83	0.81	1.29	1.19	2.15
2014 年	1.13	0.72	0.89	0.79	1.51	1.25	0.74	0.75	0.77	0.93	0.83	1.25	1.16	2.46
2015 年	1.21	0.71	0.89	0.88	1.44	1.35	0.66	0.47	0.79	0.93	0.95	1.33	1.30	2.45
2016 年	1.35	0.69	0.92	0.92	0.64	1.48	0.66	0.40	0.76	0.89	1.15	1.27	1.39	2.44
2017 年	1.36	0.73	0.90	0.90	0.74	1.63	0.66	0.53	0.79	0.93	1.16	1.17	1.34	2.64
2018 年	1.32	0.68	0.85	0.89	1.52	1.69	0.70	0.46	0.69	0.95	1.09	1.07	1.22	2.57
均值	1.32	0.75	0.98	0.88	1.12	1.44	0.72	0.54	0.78	0.85	0.95	1.31	1.28	2.27
潜力等级	潜力再造	潜力巨大	潜力开拓	潜力开拓	潜力开拓	潜力再造	潜力巨大	潜力巨大	潜力巨大	潜力开拓	潜力开拓	潜力再造	潜力再造	潜力再造

分国家积极推动贸易的同时,保留部分未来发展的动力,为创造新的贸易增长点打下良好基础。

以日本为例,中国出口日本属于潜力巨大型。日本的人口、土地等资源较为稀缺,致使其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65 岁以上老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28.7%),劳动力不足,本土无法实现大规模的生产制造。而我国属于人口大国,资源相对充裕,可以将基础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跳板,进而稳步上升至“高、精、尖”技术的开发。目前我国与日本之间仍存在部分历史遗留问题,中日韩自贸区也尚未成立,可以看到,如若能妥善解决相关问题,共同搭建起中日韩自贸区,中国在对日本的出口贸易方面定能产生更加巨大的效益。

再从出口越南的视角出发,越南属于中国出口贸易的潜力再造型国家,这与越南自身的经济体规模、地理位置及相关政策等因素有关。越南在整个 RCEP 及东盟十国中的经济实力并非最强,但通过笔者的测算,在 RCEP 成员国中,我国对越南的整体贸易增速位居第四,甚至大大超越了东盟十国内部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越南与我国接壤,同时该国也较早地加入到“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之中,我国对越南的贸易扶助力度十分巨大,目前就中国出口越南而言最重要的是要开创一条双边贸易发展新道路。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充分重视与越南贸易的这一环,对推动 RCEP 的发展也会起到很大作用。

三、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本文基于扩展贸易引力模型的视角,将人口、汇率、共同边界、共同语言引入传统引力模型内,选择中国与 RCEP 成员国 2010-2018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通过本文的研究发现,在分析中国与 RCEP 成员国间出口贸易的影响因素时,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 GDP(0.657%,0.655%)、各国的人口(0.211%)、共同边界(0.175%)与共同语言(1.130%)的存在对出口贸易的开展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各国间的距离(-0.454%)、人民币兑美元汇率(-1.991%)对双边贸易而言会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同时,研究还发现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共同语言的存在与否及汇率的波动程度对双边贸易的开展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基于扩展贸易引力模型,本文测定出中国与 RCEP 成员国间的出口贸易潜力指数,并依据以往研究划分为 4 个潜力巨大型国家、5 个潜力开拓型国家与 5 个潜力再造型国家。研究发现中国与大部分成员国的出口贸易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与探索,只有少部分国家需要开辟一条新型贸易发展道路。

(二) 建议

1. 抓住历史机遇,深挖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在党和政府提出“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框架下,面对新冠病毒疫情给全球经贸领域带来的严重影响,中国应深度挖掘自身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做细、做好“十四五”规划相关领域的改革与创新,推动本国生产力的进一步革新,带动国内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在国际贸易方面,中国要勇于承担起大国的责任与担当,凭借自身超大规模的市场及生产潜力,充分发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优势,打开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局面;深入研究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抓住 RCEP 成功签署后的历史机遇,妥善应对在双边贸易领域可能发生的挑战。

2. 主动采取措施稳定人民币汇率,推动国际贸易开展

影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因素有很多,存在较为显著关系的有短期资本流动、股票价格等^[7]。中国应加快建立健全短期资本流动的相关预警机制,防范国际游资借国际贸易之手对中国国内资本市场进行攻击,进而防止出现类似亚洲金融危机的恶劣情形。同时,中国也应与世界各国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的对接,在经济政策的差异性中寻找共同点,同心合力推动国际金融市场向好、向上发展。另外,从国与国间的经济、政治交流出发,中国应积极推进“南北对话、南南合作”的开展,使各国更多地享受到经济贸易全球化带来的红利,稳定国际贸易的发展秩序,扩大国际贸易的市场规模。

3. 加快自贸区构建进度,助力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目前中国已与二十多个国家和组织签订自贸区协定,对近期签订和正值谈判的自贸区而言,一方面,中国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签署后,应加快国内有关法律程序的审核,推动 RCEP 在国内、国际的落地生根;另一方面,就中国日前与新西兰签署的自贸协定升级版来说,这是双方在认识到原有自贸协定带来的福利效应后的进一步举措,这将有助于其他尚在谈判阶段的自贸区的构建。从中日韩自贸区出发,中国、日本、韩国目

(下转第 32 页)

从表 5 可以看出, 整个湖南省经济实力排名依次为长沙、衡阳、株洲、岳阳、常德、郴州、湘潭、邵阳、永州、益阳、娄底、怀化、湘西和张家界, 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状况异常明显, 合理培育经济增长极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将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从综合得分的结果来看, 长沙的经济实力在 14 个城市中远超其他城市, 居于首位, 充分说明了长沙市的极化效应是非常明显的。从各主成分的得分结果来看, 长沙市在三个主成分的得分都相对较高, 尤其是在第一主成分经济活力因子上来说是遥遥领先的, 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一方面, 长沙是湖南省的省会城市, 是湖南省的经济发展中心, 融汇着全省绝大多数的经济资源要素; 另一方面, 也与长沙市制定的“盘活”经济政策是离不开的。此外, 中欧班列(长沙)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也在积极为长沙进出口总额创收。从整体来看, 衡阳、株洲、岳阳等城市排名也相对靠前, 而张家界、湘西、怀化等城市的排名比较落后。

基于以上结果, 结合湖南省经济发展现状, 提出以长沙为核心增长极, 以衡阳、株洲、岳阳等城市为次增长极的发展策略, 集中资源信息优先发展长沙, 形成规模经济效应, 再以长沙为“核心”辐射至衡阳、株洲、岳阳, 达到资源信息从高级中心向次级中心传递的目的, 最后由长沙、株洲、衡阳、岳阳等城市扩散至湖南省其他城市(州县), 带动其他城市(州县)的发展, 推动“点-线-面”的发展乃至整个湖南省经济的协调发展。

四、结语

本文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分析湖南省 14 个地市的经济发展数据, 通过比较关联度大小筛选出 12 个指标, 构成评价指标体系, 尽可能规避指标选取过程中出现的主观性问题。对筛选得出的 12 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发现, 可以用经济活力因子、收入能力因子、发展能力因子等充分解释上述的评价指标体系, 综合评分结果也很好地吻合了湖南省的经济发展现状。结合增长极理论, 确定

了以长沙为湖南省核心增长极, 株洲、衡阳、岳阳三个城市为次增长极的发展策略, 在此基础上形成经济综合体, 并形成规模经济效应, 随着多个“增长极”的迅速增长, 以实现湖南省经济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 [1] 肖金成. 将新区培育为区域发展新型经济增长极[J]. 区域经济评论, 2017(1): 43-45.
- [2] 金凤君, 姚作林, 陈卓. 环南海区域发展特征与一体化经济区建设前景[J]. 地理学报, 2021, 76(2): 428-443.
- [3] 刘杰. 增长极理论对菏泽区域经济发展的启示[J]. 经济地理, 2010, 30(12): 1961-1965.
- [4] Emilian M. Dobrescu and Edith Mihaela Dobre. Theories Regarding the Role of the Growth Poles in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J]. 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4: 62-267.
- [5] Emilian M. Dobrescu. Shanghai an Important Growth Pole of China's and for The Planet [J]. 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5(22): 20-25.
- [6] Li Li, Su Jing and Yao Guoquan, 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growth poles of Hebei seaports based 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2010 Third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Modeling, Wuhan, 2010: 413-416.
- [7] Zhang Ying and Wang Yanting, On the selection of growth pole among higher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in H province, 2010 Second IIT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oscience and Remote Sensing, Qingdao, 2010: 500-501.
- [8] Vertakova Y, Polozhentseva Y, Klevtsova M. The Formation of the Propulsive Industri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cting as the Growth Poles of Regions [J]. Procedia Economics & Finance, 2015, 24(1): 750-759.
- [9] 华玉, 邹艳梅, 佟继英. 环京津地区新的发展增长极的定量选择[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3(12): 100-105.

[责任编辑: 王凤娟]

(上接第 4 页)

前均已加入 RCEP, 表明各国间对经济发展目标的总体认识是一致的, 中国应借 RCEP 签署的机遇, 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更上一层楼, 进一步提高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水平。另外, 中国也应当时刻关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动态, 向 CPTPP 发出积极的信号, 从而进一步扩大贸易规模, 深化同各国在经贸领域的合作。

[注释]

①*、**、*** 分别代表通过 10%、5%、1%的显著性检验, 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参考文献]

- [1] 周曙东, 郑建. 中国与 RCEP 伙伴国的贸易效率与影响因素——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18(7): 89-97.

- [2] 周念利. 基于引力模型的中国双边服务贸易流量与出口潜力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0, 27(12): 67-79.
- [3] 喆儒, 王楚盈. 中国机电产品出口东盟的贸易潜力研究[J]. 价格月刊, 2020(9): 36-43.
- [4] 王培志, 潘辛毅, 张舒悦. 制度因素、双边投资协定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面板数据[J]. 经济与管理评论, 2018, 34(1): 5-17.
- [5] 盛斌, 廖明中. 中国的贸易流量与出口潜力: 引力模型的研究[J]. 世界经济, 2004(2): 3-12.
- [6] 刘青峰, 姜书竹. 从贸易引力模型看中国双边贸易安排[J]. 浙江社会科学, 2002(6): 16-19.
- [7] 吴丽华, 傅广敏. 人民币汇率、短期资本与股价互动

关系研究[J]. 经济研究, 2014, 49(11): 72-86. <http://www.cnki.net>

[责任编辑: 高萌]